

***Power of Place: The Religious Landscape of the Southern Sacred Peak (Nanyue) in Medieval China.* By JAMES ROBS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xx, 506pp.**

大多數中國宗教史學者都是分為佛教研究或道教研究，我們如何跳到宗派分類之外來推進我們對中國宗教的理解？隨着中國佛教史的研究者日漸認識到地理問題的根本性和重要性，地方宗教地理(local religious geography)是其中一個方向。羅柏松(James Robson)的 *Power of Place: The Religious Landscape of the Southern Sacred Peak (Nanyue) in Medieval China* 一書(以下簡稱為 *Power of Place*) 是這一研究方向的新成果。

Power of Place 關注的是中國聖地(sacred site)「五嶽」(five sacred peaks)之一的南嶽衡山，從它成為南嶽開始到唐代末年的宗教史，藉着對這一聖地的整體研究達到兩個目標：一方面，作者希望細緻處理中國對不同組合的聖地的分類方式的性質和歷史發展過程，解決南嶽頭銜在隋朝確立於衡山之前的變遷歷程問題；另一方面，作者試圖論證宗教的空間呈現與實踐的多樣形式可在同一聖地的圖景中展開，強調各種宗教傳統之間的互相促進和緊張關係，以南嶽衡山的個案考察證明區域研究(place studies)應得到中國宗教史研究的重視。

Power of Place 一書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份“Situating Nanyue”包括三章，主要討論南嶽的位置及其變遷的歷史過程。

第一章討論五嶽的組合與中國人的宇宙觀和政治地理的相互關係。作者指出，五嶽系統的形成既複雜又不清楚，很難梳理出一個精確的編年，但通過考證商代甲骨文、《左傳》、《國語》、《竹書紀年》、《尚書》、《爾雅》、《呂氏春秋》、《淮南子》、《周禮》等漢代以前文獻中與「嶽」相關的記載，在政治地理方面，作者認為從先秦時期到了秦漢時期，帝國的山脈祭祀經歷了一個演進的過程，「五嶽」從一般的山峰組合轉變為帝國統治能達到的最遠區域所在的五座山峰的組合，這些山脈作為高級的神靈和保護者被視為帝國祭祀中的聖地，秦漢時期五嶽系統擴張到華北就說明五嶽在地理上的擴張與帝國的擴張直接相關。在文化方面，作者認為五嶽在道教的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五嶽並未在道教中形成封閉而排他性的宗教地理，而是融入到中華帝國廣闊的宗教地理系統中，道人不僅通過塑造五嶽的宗教意義而掌控它們有力的神靈，並且到那些山峰建立起道觀等制度性的設施。在更

為底層的社會來看，《龍魚河圖》、《孝經鉤命訣》等資料說明在早期，一個修道者並不需要去到一個特殊的「嶽」也能受惠於它的力量。

在梳理五嶽系統形成過程的同時，作者發現有趣的是很多山同時具有「南嶽」的頭銜，在隋代之前至少有衡山、霍山、赤城山三座，這引發作者的問題：在整個中國歷史中，南嶽究竟是指哪座山？由於從帝國的敕封來看，隋代以後南嶽就是指湖南衡山，第二章作者處理南嶽頭銜在隋代以前如何變遷的問題。公元前107年，漢武帝突然宣佈南嶽遠在南方，決定改在較近的霍山（在今天安徽省，又稱作潛山或天柱山）舉行南嶽的祭祀儀式，與「嶽」相匹配的儀式隨著「嶽」頭銜的轉變而在不同的山之間轉換。南嶽的位置是五嶽中最不穩定的，爲了爭取宗教旅遊資源，現代的《天柱山志》仍在努力證明天柱山是南嶽最原始的地點，但作者考證《詩經》、《尚書》中的「舜典」、《尚書大傳》等早期文獻，認為南嶽的原始地點在湖南衡山。自漢武帝將南嶽遷到霍山，霍山保持這一頭銜直到隋朝。其中在六朝時期（220—581），南嶽的地位又抬高到一個新的高度，因為它是五嶽中唯一一個仍在帝國版圖內能夠舉行國家儀式的聖地。根據《搜神記》的資料，作者認為在四世紀，南嶽的祭祀儀式在霍山紮根，而帝國祭祀轉移到一個新的山嶽，必然面對地方的信仰和儀式傳統，東晉穆帝時期（357—361）何琦上奏〈請修五嶽祠〉，請求恢復五嶽的官方祭祀的例子正體現了這一問題。為何何琦對復興南嶽的國家禮儀如此感興趣呢？何琦是霍山附近極度顯赫的廬江何氏家族的一員，從漢代末年到何琦的年代，霍山已經有很長的歷史是控制在地方宗教領袖手中，如具有師承系譜的南嶽大師。重興霍山的國家禮儀和重申自己家鄉重要山嶽的高級地位，既能處理掉「過多的」地方信仰，也將給何氏家族帶來各種各樣有形的和無形的利益。這一個案也說明四到五世紀期間南嶽確實指的是霍山。

第三章主要根據《南嶽總勝集》介紹隋代以來湖南省內的南嶽衡山的自然地理，以及大禹、祝融和屈原等神或人物的故事所構建的衡山的虛構地理。一般認為衡山包括七十二峰，分佈在湘江流域，最高峰為祝融峰，而作者指出在湖南長沙馬王堆的考古發現中卻沒有衡山的標識，並進一步考證文獻也證實祝融在五世紀時並未被視為南嶽的主要山峰，作者僅能在五世紀末或六世紀初的本地地理文獻《長沙志》中確定祝融峰是南嶽最高峰。

第二部份“*The Daoist and Buddhist Histories of Nanyue*”包括五章。第四、五、六章分析南嶽道教歷史，第七和第八章則討論南嶽佛教的歷史。

作者根據《南嶽小錄》對南嶽道教歷史的時代劃分（唐代以前及唐代）

進行章節劃分，第四章討論唐代以前的道教歷史和九真人，第五章討論唐代南嶽道教的發展和主要人物。在《南嶽總勝集》中，唐代以前南嶽被描述為一個能夠修煉成仙的重要地方之一，徐靈期就被告知，如果他想升仙，就應該從廬山去南嶽。關於六朝時期在南嶽成仙的九真人的文獻，主要有《南嶽小錄》、《南嶽總勝集》和《南嶽九真人傳》。有趣的是，研究九真人的現存大多重要資料都保存在佛教《大藏經》中的《南嶽總勝集》版本中，而非《道藏》中。南嶽九真人何時被塑造成一個團體並不清楚，只知道他們在六世紀中被聯繫起來。通過對這九位真人的生平事蹟的分析，作者發現九真人能夠成為一個團體關鍵在於地點上的聯繫，而非具有單一的道教傳統或宗派，真正將這些人物聯繫起來的是他們與南嶽的成仙效驗相關。

第五章主要利用地方歷史記載《南嶽小錄》探討唐代南嶽的道教發展。《南嶽小錄》展現了南嶽的宗教地理，包括重要山峰和水路的條目，以及在南嶽修仙並最終修成正果的重要道人，一直記錄到唐末。基於唐代以前南嶽已經有一些神話傳說、九真人的遺存和制度性景觀的建設，南嶽道教在唐代的發展得到皇帝及宮廷內宦等人的支持，發展出一支以司馬承禎為創始人的重要的上清支派。作者認為南嶽的道教歷史說明南嶽有一個帝國道教進入地方層面發展的過程。除此之外，作者對劉炫鏡、李泌、薛幽棲、申泰芝、衡嶽真子等唐代道人在南嶽的修煉、與王朝的關係，以及與僧人的交往等方面進行描述，認為人物與地點之間具有相互促進的關係，一方面道教人物的眾多使得地方文獻中充滿豐富的傳記和生平敘述，另一方面地方的宗教靈驗也能促使凡人升仙，之後這些人的升仙故事又增添了這個地點的神聖性。

第六章展現了南嶽女性道教信徒的重要面向。作者首先找到南嶽最有名的道教女神西王母，自漢武帝時期開始，南嶽建立了很多拜祭西王母的宮觀。西王母之外，還有王妙想、魏華存（252—334）等。隨着魏華存（魏夫人）在四世紀的神化，她與捉摸不定的南嶽頭銜密切地聯繫起來，而她與衡山的從屬關係則是從隋代後期或唐代初期開始。在唐代，南嶽修道者的關注從西王母轉移到魏華存，南嶽祭祀她的主要地點是紫虛閣（天寶年間建）和西靈觀，到唐朝，衡山成為紀念她的重要地點之一，也成為崇拜她的女性道教信徒的據點。一群不那麼出名的女性道教信徒在唐代開始進入南嶽尋道，在衡山生活和修行，並建立新的道壇，作者對這些女性道教信徒進行了傳記式的敘述。

由於南嶽沒有進入佛教「四大名山」的名錄，南嶽的佛教歷史相對較為被佛教史忽略，在最後兩章，作者試圖將南嶽放進中國佛教歷史的圖景，討

論唐代以前以及唐代南嶽豐富的佛教歷史。

在第七章中，作者除了利用《大藏經》中的《南嶽總勝集》外，還大量利用經常被佛教史研究者忽視的地方歷史文獻和碑銘來探討佛教的早期發展，主要關注天臺宗的創始人慧思（515—577）及其追隨者的到來給南嶽宗教歷史帶來的重大影響，從中看到僧人在一個具有悠久宗教歷史的聖地建立新的宗教地理的策略。雖然佛教僧人在陳朝之前已經進入南嶽，並且在梁朝開始建立佛寺，南嶽佛教史最重要的事件是567年慧思的到來。作者在簡要敘述慧思的生平之後，談到慧思的〈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並詳述他的到來。慧思到了南嶽之後，除了將山神轉化成佛教神明，奪取它最好的田地，還開始接管重要的道教場所，同時慧思也製造一些傳說故事來將僧人與這些宗教場所的關係追溯到更久遠的歷史。通過慧思與道教的鬥爭故事，慧思從山神和道教兩個方面取得土地的過程獲得了合法性和合理性，這體現了佛教壓倒道教的一面，而慧思〈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的道教風格則反映了另一面。慧思的活動很快就吸引了龐大的跟隨者，其中十八高僧的出現是南嶽佛教發展的展現。作者根據《南嶽十八高僧傳》對南嶽十八高僧的傳記逐一書寫，在十八高僧中，慧思理所當然的排在第一，他被定義為一個家族的術語「祖父」，這種傳記的形式強調師承關係、禪修和這群僧人對南嶽這一地點的依附。作者指出不能將十八高僧描述為天臺宗的一個「宗派」，認為十八高僧的禪修和對南嶽的附屬是使他們成為一個組合的主要原因。

第八章評述唐代南嶽佛教群體的成長和發展，論證南嶽是整個中國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作者首先從早期禪宗的文獻中尋找禪修者和南嶽的痕跡，認為南嶽作為一個禪修中心的地位，得自於它與早期天臺宗人物的聯繫。作者對地點－姓名的書寫模式在禪宗中的使用保持高度敏感，認為地點常常附於僧人名字前面，並且經常在他們的傳記文字中體現，可以幫助我們追尋僧人的足跡，但它們也被用於論證（或製造）一個僧人與一個地點的聯繫，用這種特別靈活的方法來鞏固一群僧人的關聯，因為與一個特殊地點的聯繫可以在建立宗派或鞏固某個宗教團體聲譽方面成為一種強大的合法性力量。作者也關注南嶽與北方的北禪、東方的牛頭禪、慧能的南禪、西方的四川禪宗群體之間的人物關係。南嶽與其他禪宗人物或思想的相互關聯，也可以為佛教史的發展脈絡提供論據，如八世紀中期，明瓚等僧人移居南嶽，正好是北禪以北方為中心轉變為北禪人口往南嶽遷移的時代。

Power of Place 一書史料扎實，觀點明確，為我們了解南嶽的上古和中古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和詳盡的分析。筆者雖然非常希望了解南嶽地區民間宗

教的早期歷史，但這明顯是苛求於作者，況且作者也明確地告訴我們很難找到關於南嶽地區早期住民的信息，除了火神祝融是顯示楚文化的線索，所有古代的遺跡都埋沒在佛教和道教湧入後留下的大量遺存中。

陳瑤

廈門大學歷史系

***Negotiating Urban Space: 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 By SI-YEN FEI.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0. 361pp.**

《談判城市空間：城市化與晚明南京》是一部關於城市化的研究，探討的是城市不斷擴展的角色和功能，是如何引導城市的觀念被重新設定、爭辯和重新構想。作者要討論的不是城市設施的建設或規劃，而是城市空間怎樣在行政和文化秩序上被定義和使用。作者試圖對話的問題有三個層面。

一、從韋伯的東西方城市論到施堅雅(William Skinner)的城鎮論都是從長時段角度出發，作者認為城市化不是伴隨長期商業化自動衍生的副產品，而是一個被不同王朝的制度和文化的不斷塑造的過程。故而應該採用以「王朝」為中心的方法來考察城市化。

二、在城市化的文化影響上，作者認為牟復禮(Frederick Mote)的城鄉連續一體論中講到城鄉連續一體在中國人心理上普通存在，並阻礙了不同於鄉村的傳統的發展。但緊接着作者就指出這種觀點的局限性，一是制度上的鄉村偏向並未像牟復禮所想的那樣抑制城市的政治覺醒；二是近年學者們的研究已經證明隨着人文和物質資源增長，城市在經濟、政治、文化上是明顯區別於鄉村的，只是通過一套鄉村的話語來表述以致掩蓋了城鄉的區別。

三、在城市化的政治影響上，作者回顧羅威廉(William T. Rowe)在漢口研究中提出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到韓書瑞(Susan Naquin)在北京研究中提出的「公共空間」(public space)，認為中國城市自治不是存在於源自國家權力機關的獨立形式，而是存在於國家代理和城市居民的談判協調中。

全書採用以小見大的方法，將微觀的南京城的四個案例與宏觀的明代王朝如何應對城市化問題相結合，意圖勾勒出城市作為一個城牆內的社區、一個大都市的區域、一個想像的空間以及一個敘述的主體之變化。